

## 敦煌莫高窟現存早期洞窟的年代問題

宿白

北京大學考古系

敦煌莫高窟第268(包括267、269、270、271四個禪窟)、272(包括273和另一個未編號的小龕)、275三窟左右毗連,是大家公認莫高窟現存最早的一組洞窟。因為敦煌處於河西走廊的西端,西隣古代西域,適當佛教東傳的要道,所以這裏現存的最早洞窟對我國早期佛教石窟的編年分期具有重要意義。遺憾的是,這組洞窟本身沒有紀年銘記,和他們接近的其他莫高窟早期洞窟也沒有紀年銘記。因此,探討這組洞窟的年代問題,一直為研究我國石窟遺跡的學人所關注。

這組洞窟年代的擬定,始於四十年代的張大千先生。張先生擬第274(張氏編號234)、275(張編233)兩窟時代為北魏,第268(張編235及其耳洞)窟時代為隋<sup>1</sup>。敦煌研究所最初沿用張說<sup>2</sup>,後來將第268窟也改訂為北魏<sup>3</sup>。七十年代末,敦煌研究所提出了這組洞窟可以早到公元421年至439年左右的北涼時期<sup>4</sup>。我們認為這個新說,在目前還沒有發現更多的新資料的情況下,是值得商榷的。

五十年代,我們探討莫高窟這組洞窟的年代問題時,曾因《魏書·釋老志》:「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舊式,村塢相屬,多有塔寺」的記載,估計他們有可能和今新疆地區某些石窟接近,但經過七十年代後期以來,開展多次對新疆石窟較全面的調查工作之後<sup>5</sup>,逐漸認識到莫高窟現存早期洞窟與自成體系的新疆石窟的關係,雖在繪畫技法方面有某些相似處,但從石窟全部內涵上考察,則遠不如與中原北方石窟關係密切;莫高窟儘管地接西域,但仍然屬於中原北方石窟系統。

1 參看謝稚柳《敦煌藝術叢錄》,上海: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11月,頁301-312。

2 參看敦煌文物研究所《莫高窟各家編號對照表》,《文物參考資料》,第2卷第5期,1951年5月,頁229-230。

3 參看陳明達等《敦煌石窟勘察報告》,《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2期,1955年2月,頁39-70。

4 參看樊錦詩等《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該文收在《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12月,頁177-189。段文傑近撰《八十年代的敦煌石窟研究》云:「大家公認268、272、275一組是最早洞窟……經過調查研究和論證,初步確定這一組洞窟屬於北涼時代,現已基本上得到國內外學者承認並引用,但不同意見仍然存在。」段文刊《中國文物報》,第40期,1988年10月7日,第3版。

5 參看《中國石窟·キジル石窟》,1至3卷,東京:平凡社,1983年12月至1985年3月;《中國石窟·クムトラ石窟》,東京:平凡社,1985年10月。

中原北方早期石窟主要有兩個中心：一是北涼都姑臧以後（公元412年至460年<sup>6</sup>）的北涼領域內及其附近諸遺跡；一是從公元460年開始開鑿的平城武州山石窟，即今山西大同雲岡石窟。前者主要遺跡發現甚少，就已知的迹象與莫高窟這組最早洞窟差異較大，而後者遺跡豐富，與莫高窟相似之處遠較北涼遺跡為多。

我們先概觀一下北涼時期涼州及其附近的有關遺跡。現在所知可靠的有關實物，主要有三項：一、甘肅武威天梯山第1窟和第2窟，兩窟都是具有中心柱的塔廟窟，殘存形像多以圓顏細目為顯著特點，邊飾花紋有化生忍冬<sup>7</sup>；二、酒泉、敦煌、吐魯番發現的北涼石塔，皆作突出覆鉢和相輪的西方形制，石塔上的主要造像是七佛與交腳菩薩的組合，石塔上還雕有與黃老道術有關的八卦和北斗七星<sup>8</sup>；三、與北涼大約同時的西秦永靖炳靈寺造像，或就崖鑿窟立佛如炳靈寺第1窟，或就天然岩洞中建淺龕如炳靈寺第169窟第6龕；佛的面相也都突出了細長的雙目<sup>9</sup>。以上所列情況，幾乎都不見於莫高窟這組現存最早洞窟。我們認為這些不見於莫高窟現存最早洞窟的絕大部分，可能都是更早的時代特徵。至於莫高窟這組現存最早洞窟與北涼石塔、炳靈壁畫中有某些類似的形像造型，如U字形體態的飛天和男女供養人服飾等<sup>10</sup>，並不能作為早於雲岡的證據，因為這些類似的內容，是包括雲岡在內的五世紀末期以前中原北方窟龕所共有的因素。

我們認為可以和莫高窟這組現存最早洞窟進行比較，並有較明確年代的石窟，是雲岡石窟。雲岡石窟一般分三期：第一期即公元460年開鑿的曇曜五窟（雲岡第16窟至第20窟），位於雲岡石窟羣的西部；雲岡中部和東部的主要石窟，即第7、8窟，第9、10窟，第11、12、13窟，第1、2窟，第3窟，屬第二期，年代約在北魏孝文帝都於平城的時期，即公元471年至494年；第三期石窟開鑿於遷洛（公元494年）以後，其主要窟龕分布在最西部，也有不少窟龕散布在前兩期石窟之間<sup>11</sup>。莫高窟這組現存最早洞窟的許多特徵都和雲岡第二期石窟相似<sup>12</sup>，現擇其較顯著者分三項試述如下：

6 460年是沮渠安周為柔然擊潰之年，《北史·西域·高昌傳》：「[沮渠]無諱死，弟安周代立。和平元年為蠕蠕所并。」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10月，頁3213。

7 參看史岩《涼州天梯山石窟現存狀況和保存問題》，《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2期，1955年2月，頁76-96。天梯山北涼壁畫及其基本現分藏甘肅省博物館和敦煌研究所。

8 參看王毅《北涼石塔》，《文物資料叢刊》一，1977年12月，頁179-188；及拙著《涼州石窟遺迹和「涼州模式」》，《考古學報》，1986年第4期，1986年10月，頁435-446。

9 參看《中國石窟·炳靈寺石窟》，東京：平凡社，1986年6月，圖版21、36。

10 參看《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一，頁178。

11 參看拙著《雲岡石窟分期試論》，《考古學報》，1978年第1期，1978年1月，頁25-38。

12 關於莫高窟資料，參看注4。雲岡資料參看日人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雲岡石窟》，1至15卷，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52-1956年。

### 一、窟室形制

平面 莫高窟第275窟平面長方形。第272窟平面方形。第268窟平面長方形，兩側各附兩個方形小禪窟。三座窟都是窟內空間較寬敞的佛殿窟(圖一)。這種窟室規整而又寬敞的長方形、方形佛殿窟，不見於雲岡第一期窟；始見於雲岡第二期的第7、8窟和第9、10窟。第7、8窟前後室皆作長方形(後室為橫長方形)，第9、10窟後室作方形。第1、2和第5窟都是雕出中心柱的塔廟窟，平面作長方形。只具一方形或長方形窟室的佛殿窟，更是雲岡第三期流行的窟式。

窟頂結構 莫高窟第272窟和第268窟及其附窟，窟頂皆作出抹角疊砌，即有些專家所謂的斗四形式的藻井或平棊(圖一)。這類窟頂都表現了對木結構的摹仿，或是部分摹仿木結構。同樣情況，在雲岡開始出現在第二期的第7、8窟，又見於第9、10等窟。

### 二、造像題材

主像 莫高窟第275窟主像是交腳菩薩(圖二)，第272窟是倚坐佛像(圖三)，第268窟是交腳佛像(圖四)。以交腳菩薩作主像，在雲岡第一期僅見於第17窟；第二期窟即成為常見的形象，如第10窟、第13窟和第1窟以及第3窟的上層窟室。倚坐佛像為主像在雲岡第一期僅見於較晚的第19窟的東脇洞；多見於第二期壁龕，如第7、8窟後室左右壁龕、第10窟前室後壁龕和第12窟前室右壁龕，作為主像則始於第9窟。雲岡不見以交腳佛像為主像的石窟，他的形像最早見於第二期第7、8窟後室左右壁龕，又見於第9窟前室右壁龕，第10窟前室左壁龕和第12窟前室右壁龕。和雲岡關係較近的遼寧義縣萬佛堂西區第6窟主像為交腳佛像<sup>13</sup>，他是中原北方石窟除莫高窟外，唯一以交腳佛像為主像的實例，其時代大約相當於雲岡第三期之初。

其他龕像 莫高窟第275窟左右壁龕中有交腳菩薩龕(圖五)、思惟像龕(圖六)。第272窟現窟口外兩側各有一禪僧龕<sup>14</sup>。以上三種龕像，在雲岡都始見於第二期窟。交腳菩薩龕見於自第9、10窟以下諸窟。思惟像見於自第7、8窟以下諸窟。禪僧像見於第7、8窟、第12窟和第5、6諸窟，其位置多在明窗左右側壁，與莫高窟第272窟安排的方位頗為類似。

千佛壁面 莫高窟第272、268窟左右壁滿壁繪千佛(圖三、四)，第272千佛之下原繪供養人行列，已為宋畫所掩蓋。雲岡第一期窟的千佛所佔面積尚小，即使是時代已晚的16窟，千佛也僅限於壁面龕像的上方。滿壁雕千佛始於第二期的第7、8窟，但該兩窟又僅限於前室的一側壁(即第7窟前室右壁、第8窟前室左壁)。值得注意的是第11窟內的兩處龕像：左壁上方邑善信士女等五十四人造石廟(廟)形像龕，該龕主龕兩側各雕千佛十一列，其下雕供養人行列；前壁上方交腳菩薩龕，主龕兩側各雕千佛四列。前一龕中部下沿有太和七年(483)

13 參看閻文儒《遼西義縣萬佛堂石窟調查及其研究》，《文物參考資料》，第2卷第9期，1951年10月，頁135-190。

14 莫高窟第272窟現窟口外北側的第273窟係一淺龕，內塑一禪僧像；窟口南側只存空龕，龕內塑像已佚，該龕未編號。

銘<sup>15</sup>。這兩座龕主龕兩側的位置與洞窟兩側壁類似。因此，前龕的紀年銘可以作為考慮這類千佛布局出現的年代的參考。

### 三、壁面布局

分欄分段 莫高窟第275窟左右壁上下分欄布局：上欄塑列龕；下欄分段繪本生或佛傳，本生、佛傳畫面中附有長條框式的榜題（文字已漫漶）（圖五），畫面下部畫供養人像一列，再下為三角垂飾。分欄布局在雲岡始見於第二期的第7、8窟前後室左右壁；與莫高窟第275窟類似的是雲岡第9、10窟前室壁面和第1、2窟、第6窟左右前壁面。第9、10窟前室壁面和第6窟左右前壁面都是上部雕兩欄列龕，下部雕一欄分段的本生和佛傳，本生、佛傳中也雕出長條框式的榜題（文字亦漫漶）<sup>16</sup>，本生、佛傳欄之下為供養人列像，再下雕邊飾。雲岡第1、2窟左右前壁面與前三窟布局相同，唯一的差異是壁面上部只雕一欄列龕，這個差異，恰好同於莫高窟第275窟。又第275窟左右壁上下欄之間，隔以各種圖案邊飾，其中單葉波狀忍冬文（圖五），據敦煌研究所統計，為莫高窟「第一期洞窟所特有，第二期及以後各期所不見。」<sup>17</sup>上下欄間雕飾邊飾，在雲岡也始於第二期的第7、8窟的前後室壁面，但與上述相同的單葉波狀忍冬，則以出現在第9、10窟後室前壁的下欄列龕欄與佛傳欄之間者為最早。

漢式建築裝飾 莫高窟第275窟左右壁上欄影塑出附有子闕的高闕，下欄壁畫中繪出漢式建築庭院。無論高闕或庭院建築，都施有鸞尾、瓦壠、橫枋、細長的簷柱，簷柱間的方窗和簷下繪出多種形式的斗拱。斗拱的樣式有一斗二升與叉手、一斗二升與直斗、一斗三升與叉手、一斗三升與直斗等組合形式（圖七）。漢式建築出現在雲岡，以第二期的第7、8窟前室側壁為最早，但僅具有雕出鸞尾的漢式屋頂；自第9、10窟前室壁面才開始雕出有一斗三升、叉手、橫枋、長柱等具有更鮮明的漢式建築特點的殿堂式佛龕。雲岡雕鑿的漢式建築與莫高窟第275窟的塑繪相比，顯然簡略得多。可以進一步與莫高窟塑繪細部比較的資料有：傳山西出土的太和二十三年（499）比丘僧欣造像背雕和出土地不詳的景明三年（502）劉未等造像背雕雕出的一斗二升與叉手的斗拱組合<sup>18</sup>；洛陽龍門石窟古陽洞南壁自下第二層大龕之間孝明帝時（516-528）補雕的殿堂龕簷下刻出的一斗二升重拱與直斗的斗拱組合<sup>19</sup>；寧夏固原北魏墓所出約屬太和十年（492）左右的漆棺畫像中繪出的一斗三升與直斗的斗拱組合<sup>20</sup>；附有子闕的高闕曾見於遷洛後雕造的石棺牀欄板<sup>21</sup>；方窗既見於上述固原漆棺畫

15 參看長廣敏雄《千佛構成》，該文收在《大同石佛藝術論》，日本：高桐書院，1946年11月，頁73-92。

16 畫面上附有長條框式的榜題，是沿襲東漢以來的傳統，為墓葬壁畫和畫像石所習見，北朝的石棺圖象和造像碑尚承此制。

17 參看注4。敦煌研究所所謂的北朝第一期窟，即指第275、272、268這組洞窟。

18 參看D. Siren, *La Sculpture Chinoise du V<sup>e</sup> au XIV<sup>e</sup> Siecle*, London, 1925, 圖版119、121。

19 參看《中國石窟·龍門石窟》一，東京：平凡社，1987年12月。圖版148。

20 參看固原縣文物工作站《寧夏固原北魏墓清理簡報》，《文物》，1984年第6期，1984年6月，頁46-56。

21 參看黃明蘭《洛陽北魏世俗石刻綫畫集》，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7年2月，圖版90。

像<sup>22</sup>，又見於遷洛以後的石棺壁板<sup>23</sup>(附表)。

通過上面的對比，可以清晰地看到：莫高窟這組現存最早洞窟和雲岡相比的，不是雲岡第一期窟，最早只能對比到第二期的第7、8窟；比較合適的應是第二期的第9、10窟和第11、12、13窟，即雲岡中部偏西俗稱「五花洞」的五個石窟。如果考慮到莫高窟第272窟的方形窟室和第275窟塑繪中的漢式建築細部，似乎與雲岡第二期窟再晚一些的資料相比更為恰當。這裏說的比較，只是說他們相似或接近，並不能把對比雙方的年代簡單地直接等同起來，因為其間還有一個誰影響誰的問題。受到影響的當然要比施以影響的時代要晚些。

如何判斷誰影響誰呢？這要考慮雙方的歷史背景。

雲岡，北魏時位於首都平城西郊。遷洛以前，平城作為魏都已近百年(398-494)，當時平城及其附近集中了大量的財富和接近百萬的人口，其中包含有來自中原北方各地的各種人

附表 莫高窟現存最早洞窟與雲岡石窟的比較

石窟窟號 對比內容		莫高			雲岡															附注					
					一期			二期									三期								
		275	272	268	20	19	18	17	16	7	8	9	10	13	12	11		1	2		5	6	3		
窟室形制	平面長方形(縱)	✓		✓						⊙	⊙		⊙	⊙		✓	✓				⊙	✓	⊙	✓	框○者為橫長方形
	平面方形		✓	附窟							✓	✓			✓								✓		
	窟頂仿木結構	✓	✓	附窟						✓	✓	✓	✓											✓	
造像(後期補入者未列)	主像交腳菩薩	✓					✓				✓	✓				✓						✓	✓		
	主像倚坐佛		✓			附窟			⊙	⊙	✓	⊙	⊙										✓	⊙	框○者非主像
	主像交腳佛			✓					⊙	⊙	⊙	⊙	⊙											✓	框○者非主像
	交腳菩薩龕	✓					✓				✓	✓	✓	✓	✓	✓	✓	✓	✓	✓	✓			✓	
	思惟像龕	✓					⊙			⊙	⊙	⊙	⊙	⊙	⊙							⊙	⊙	⊙	
	禪僧像		✓						✓						✓									✓	框○者非龕像，位於交腳菩薩兩側
	千佛壁面		✓	✓			⊙	⊙	⊙	⊙	⊙					⊙								✓	⊙
壁面布局	分欄分段	✓							✓	✓	✓	✓				✓	✓	✓						✓	框○者非全部壁面
	榜題	✓									✓	✓				✓	✓								
	漢式建築	✓									✓	✓	✓	✓	✓	✓	✓	✓	✓	✓	✓			✓	框○者不具細部

22 參看注20。

23 參看注21，圖版30。此石棺壁板傳出元謚墓。元謚葬於正光五年(524)，見《元謚墓志》，參看趙萬里《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學專刊乙種第二號，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年1月，圖版171。

才,北魏皇室權貴在雲岡與鑿石窟之初,平城內外的佛寺修建已繼續進行了半個多世紀<sup>24</sup>,儘管其間經歷了六、七年的滅佛階段。因此,我們可以設想當時平城的佛教藝術已具有一定的基礎。如果說,我們對復法不久開鑿的雲岡第一期石窟完全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抱有疑慮的話<sup>25</sup>,那麼,大批興建的第二期石窟工程已完成「雲岡模式」,應該說是沒有甚麼問題。遷洛以後,雲岡窟龕的雕造並未衰歇,大約到了公元515年孝明帝即位後,洛陽才大事興修佛寺,中原北方地區才又出現一個新的佛教建置的典型所在<sup>26</sup>。以上是在說明,從公元460年以後到六世紀初,出現可以作為東方石窟模式的地點,雲岡最具條件;六世紀初以後,才又增加了一個洛陽。

至於敦煌地處綠洲,物產人口均受限制,經濟發展多賴商業,五涼之初尚稱繁榮。公元405年北涼李暠曾移西遷敦煌的外地人戶於酒泉。公元421年北涼且渠蒙遜攻佔敦煌後,又「屠其城」<sup>27</sup>。公元442年北魏下敦煌,且渠「無諱自率萬餘家棄敦煌,西就安周。」<sup>28</sup>此後,北魏爲了經營西域和防禦柔然,在敦煌設置軍鎮。接着就是公元446至452年太武帝毀佛廢法。廢法結束,正值柔然勢盛。所以,公元474年魏廷曾有放棄敦煌東就涼州之議。公元487年柔然敗於高車,公元492年魏又大破柔然,柔然從此衰微,敦煌才漸趨安寧<sup>29</sup>。因此,自北涼據敦煌迄北魏破柔然這段期間,敦煌所重在於軍事,很難想像這樣一處人力財富並不富裕,且忙於軍備之不暇的地點,還能在佛教建置上創出甚麼可以影響內地的新成就。

根據上述歷史背景的考察,平城、敦煌兩地在石窟方面的相似或接近,我們認爲只能是雲岡影響了莫高,都城影響了地方,而不可能是相反。其實雲岡向西影響敦煌並不突然,陝北、隴東和河西東部、中部地區遷洛前後開鑿的洞窟,幾乎都可發現雲岡因素<sup>30</sup>。

24 參看拙著《平城實力的集聚和「雲岡模式」的形成與發展》,該文收入《中國石窟·雲岡石窟》一,東京:平凡社,1989年4月,頁170-199。

25 過去曾根據《魏書·釋老志》:「太延中[435-439],涼州平,徙其國人於京邑,沙門佛事皆俱東,象教彌增矣」(北京:中華書局,1874年6月,頁3032)和慧皎《高僧傳·玄高傳》:「時河西國[即北涼]沮渠牧犍,時有沙門曇曜,亦以禪業見稱,僞太傅張潭伏膺師禮」(金陵:金陵刻經處,清光緒十年[1884]刻本,卷十二,頁十一上)的記載,懷疑雲岡第一期曇曜五窟多存涼制,甚至可屬「涼州模式」。經過對現存北涼遺迹的清埋和對曇曜五窟全面考察之後,現在我們認爲曇曜五窟的確曾受涼州的某些影響,但本身亦是當時創新的石窟類型。參看注24。

26 參看拙著《洛陽地區北朝石窟的初步考察》,該文收在《中國石窟·龍門石窟》一,1987年12月,頁216-234。

27 見《晉書·李士業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11月,頁2271。

28 見《宋書·大且渠蒙遜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10月,頁2417。

29 參看拙著《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敦煌——〈敦煌兩千年〉之一》,該文收入《絲路訪古》,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頁15-38。

30 關於雲岡石窟的影響問題,我們將另文討論。雲岡影響表現在山西以西各地的資料,可參看靳之林《對〈延安地區的石窟寺〉一文的訂正》,《文物》,1984年第12期,1984年12月,頁25-28;甘肅省文物工作隊《隴東石窟》,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11月,頁19;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西石窟》,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10月,圖版150、151;《中國石窟·麥積山石窟》,東京:平凡社,1987年5月,圖版2-6、33;《中國石窟·炳靈寺石窟》,東京:平凡社,1986年6月,圖版80-102。

既然可以判斷施以影響的是雲岡,那麼,即可根據雲岡有關石窟的年代推測莫高窟這組現存早期洞窟的具體年代了。雲岡第二期最早的石窟是第7、8窟,大約開鑿於孝文帝初期(471-483?)。第9、10窟晚於第7、8窟,其年代依照《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記載,可推測為「大代太和八年[484]建,十三年[489]畢。」第11、12、13窟開鑿的時間接近第9、10窟或略早。第1、2窟較第9、12窟略晚。第二期的第5窟和第3窟上層之交腳菩薩窟室大約都完工於遷洛(493)前不久<sup>31</sup>。由此,大體可以估計莫高窟這組現存最早洞窟的年代:其上限可能接近於雲岡第9、10窟開鑿的太和八年,下限則或許要推遲到遷洛前後。因為還要考慮從中原北方地區影響到河西西端的敦煌,需要一段時間,例如莫高窟第285窟北壁有大統四年(538)比丘誓化發願文的迦葉佛說法圖和有大統五年(539)滑黑奴發願文的無量壽佛說法圖,兩圖中的佛像及其脇侍菩薩尚是雲岡第三期(公元494-524)流行的褒衣博帶秀骨清像<sup>32</sup>。而當時洛陽地區比大統四或五年至少要早十多年的鞏縣大力山石窟第1窟已盛行服飾簡潔體態豐壯的造型了<sup>33</sup>。這種簡潔豐壯的造像出現在莫高窟,已晚到一般公認的北周時期<sup>34</sup>。以此類推,把這組莫高窟現存早期洞窟年代的下限,安排在遷洛之後不久,可能較為穩妥。這樣,第275窟左右壁出現的某些漢式建築裝飾細部與遷洛後遺物上的刻畫有相似之處,就容易理解了。

1965年,敦煌研究所在莫高窟第125窟與第126窟之間崖體裂縫中的沙土內發現有□□十一年廣陽王發願文的殘綉一件<sup>35</sup>,研究所認為這件綉品「應該是平城一帶人帶到敦煌來的」;並認為「十一年」之前的缺文應是太和紀元。以上推斷都是正確的。在作出上述推論之前,研究所曾將殘綉與莫高窟其他北魏洞窟作了比較:「刺綉為一佛二菩薩式的說法圖,佛結跏、露腳、坐覆蓮,菩薩侍立、跣腳、踩覆蓮、裹長裙,與敦煌251、260等窟的小型說法圖相似,特別是藝術風格、表現手法基本相同」;「[刺綉]花邊中的聯珠狀龜背紋與忍冬紋套疊的形式,在莫高窟259窟、248窟可以找到同類型的紋樣」;「女供養人衣服上的桃形忍冬紋,在莫高窟251、260窟也可以看到類似的紋樣。」

除此之外,我們認為綉品中殘存的部分人物還可與莫高窟現存這組最早洞窟相比較:

一、綉品下部殘存的男女供養人戴高帽,着窄袖襦襖(男供養人襦襖部分已破損),這種

31 參看注10。

32 參看注4及拙著《參觀敦煌第285號窟札記》,《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第2期,1956年2月,頁16-21。

33 參看《中國石窟·鞏縣石窟寺》,東京:平凡社,1983年6月,圖版38-42、103。鞏縣第1、3兩窟的年代,約在孝文帝時期(515-528),參看注26。

34 參看注4。北魏晚期流行的簡潔豐壯形象之所以遲遲才傳入敦煌,當與其時局勢動亂,交通阻塞有關。

35 參看敦煌文物研究所《新發現的北魏刺綉》,《文物》,1972年第2期,1972年2月,頁54-60。以下有關引文皆出於此。

服飾即是太和十八年(494)革禁的胡服<sup>36</sup>。莫高窟現存洞窟內着胡服的供養人像,僅見於這組最早的洞窟;第275窟最為清晰,第272和第268窟供養人行列皆為宋畫所掩,第268窟宋畫之下似有胡服與非胡服兩式並存的迹象。

二、殘存的坐佛下部所表現的大衣,自腿以下尚未折出衣文。這種作法,在莫高窟只與第275窟和第272窟的交腳菩薩像裙子下部未折出衣文的情況相似,而莫高窟自第259窟始<sup>37</sup>,坐像和交腳像下部衣文的處理,就不是這樣簡潔了。

三、殘存的夾侍菩薩下部所表現的緊裹雙腿的長裙,腿兩側的外撇裙邊尚不顯著;繞臂垂下的帔端尚折成三角狀。這些作法都見於第275窟。第272、268兩窟下部裙邊顯露外撇的供養菩薩形像也不多見<sup>38</sup>,但自第259窟以後,裙邊不外撇和帔帛下端折作三角狀的作法,即從少見趨向於消失<sup>39</sup>。

上面的比較,除給莫高窟受到平城影響增添了實物證據之外,也給討論莫高窟現存這組最早洞窟的年代,提供了新資料。當然,綉品發願文中的太和十一年,也應如前述根據雲岡諸窟的年代擬定與之接近的莫高窟現存最早洞窟年代的情況,即只能作為他們年代上限的參考。

以上我們擬定莫高窟現存這組最早洞窟年代的下限是:從接近太和八年(484)和太和十一年(487)起,至太和十八年(494)遷都洛陽以後不久。

大約在接近此上限的年代,敦煌鎮升格設置了都大將,第一任敦煌鎮都大將很可能就是太和九年以前從平城西來的北魏助貴長樂王穆亮<sup>40</sup>。太和十一年侵擾北邊的柔然開始衰弱,敦煌漸趨安定<sup>41</sup>,西方商路因得重新開通。太和十一年、十四年、十五年都曾有中亞粟特使者來平城朝獻<sup>42</sup>,之後不久就出現了景明正始間(500-507)葱嶺東西、波斯、印度等數十

36 《魏書·高祖紀下》:「[太和十八年十二月]壬寅,革衣服之制。」(頁176)《通鑑·齊紀五》:「[建武元年即北魏太和十八年十二月]魏主欲變易舊風,壬寅詔禁士民胡服,國人多不悅。」(香港:中華書局,1972年2月,頁4370)《魏書·景穆十二王傳·任城王澄傳》:「[太和十九年五月]高祖還洛,引見公卿。……高祖曰:『朕昨入城,見車上婦人冠帽而著小襦襖者』(《通鑑·齊紀六》作:「昨望見婦女猶服夾領小袖」,頁4387),若為如此,尚書何為不察?』澄曰:『著猶少於不著者。』高祖曰:『深可怪也!任城意欲令全著乎?一言可以喪邦者,斯之謂歟?可命史官書之。』又曰:『王者不降佐于蒼昊,皆拔才而用之,朕失於舉人,任許一羣婦女輩奇事,當更證簡耳。……』於是留守羣臣遂免冠謝罪。」(頁469-470)可見改革一般民庶胡服在太和十八年以後。

37 莫高窟第275窟菩薩裙邊外撇不顯著者居多。亦有少數外撇較顯著者,但自第259窟以後裙邊外撇似成定制。

38 敦煌研究所認為從第259窟起,即屬北朝第二期;第275、272、268三窟為北朝第一期。參看注4。

39 帔端下垂折作三角狀,偶見於莫高窟第259、254、251等窟。

40 參看注29。

41 穆亮任敦煌鎮都大將的時間,文獻無徵。「太和九年以前」,係據《魏書·穆亮傳》所記亮後任都督秦梁益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領護西戎校尉、仇池鎮將時,表請納宕昌王梁彌機元子彌承,因拜彌承為其國王的時間推測。

42 《魏書·高祖紀上》(頁139)和《册府元龜·外臣部·朝貢二》(香港:中華書局1960年6月影印明刻初印本,卷九百六十九,頁七上至七下[總頁11390])俱記:悉萬斤國遣使朝獻。按悉萬斤即康國,康國在粟特諸國中最稱富盛。該國都城在今蘇聯烏茲別克加盟共和國撒馬爾罕之東。



國家和地區遭使東來的盛況<sup>43</sup>。于闐附近捍婁夫寺所懸太和十九年(495)、景明二年(501)魏國綵幡<sup>44</sup>和1981年大同小站村正始元年(504)封和突墓所出獵豬文薩珊鍍金銀盤<sup>45</sup>，當是這時期中西交往的物證。此後，絲路暢通。所以，孝明時期「自葱嶺已西，至於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sup>46</sup>也就在敦煌趨向於平靜時，北魏才能較多的向敦煌謫譴重要犯人，其中有來自盛行佛教、多聚名僧的徐州附近的下邳太守張攀父子(太和十五年前不久)<sup>47</sup>，有來自洛都的宗室東陽王元丕諸庶子(太和二十一年)<sup>48</sup>。宣武之初，又詔徙寵侍趙脩「敦煌為兵」(景明四年)<sup>49</sup>。敦煌的豐歉，這時也引起了統治者的重視。正始四年(507)曾因「敦煌民飢」，詔「開倉賑恤」<sup>50</sup>。看來，在我們擬定的莫高窟現存最早洞窟年代的上下限期間內，敦煌出現了一個新的發展局勢：既迎來了商業的繁榮，又與東方佛教興隆的地點，特別是和盛鑿石窟的新舊兩都加強了密切的聯繫。因此，受到內地影響的莫高窟現存最早洞窟出現於此時，接着這裏又開鑿了一批內地因素更多的洞窟<sup>51</sup>。這些現象，很明顯都是和當時敦煌歷史情況相契合的。

43 《魏書·世宗紀》：「[景明三年]秋七月癸酉，于闐國遣使朝獻。……是歲，疏勒、罽賓、婆羅捺、烏菟、阿嚩陁、羅婆、不耨、施拔羅、弗波女提、斯羅、嚩舍、伏耆奚那太、羅槃、烏稽、悉萬斤、朱居槃、訶盤陁、撥斤、厭味、朱沱洛、南天竺、持沙那斯頭諸國並遣使朝貢。」(頁194-195)「[四年夏四月]庚寅，南天竺國獻辟支佛牙。」(頁196)「[正始]四年……三月丙子，疊伏羅國遣使朝貢。……[夏四月]悉萬斤諸國並遣使朝獻。……[六月]丁未，社蘭達那羅、舍彌、比羅直諸國並遣使朝獻。……[九月]疏勒、車勒阿駒、南天竺、婆羅等諸國遣使朝獻。冬十月丁巳……悉萬斤、可流伽、比沙、疏勒、于闐等諸國共遣使朝獻。……戊辰，疏勒國遣使朝貢。……辛未，嚩嚩、波斯、渴槃陁、渴文提不那使忸杖提等諸國，並遣使朝獻。……[十一月]己酉，阿與陁、呵羅槃、施跋吐羅諸國並遣使朝獻。……[十二月]辛酉，特那杖提沙鉢離阿失勒摩致鉢諸國遣使朝貢。……丁丑，鉢耨、波利伏佛青善、乾達諸國遣使朝貢。」(頁204-205)以上諸國和地區考知今地者：于闐、疏勒、朱居槃、訶槃陁等在葱嶺東，今新疆西部；施跋、嚩嚩、悉萬斤等在葱嶺西，今中亞地區；烏菟、罽賓、不耨(鉢耨)、婆羅捺、阿嚩陁、南天竺等在巴基斯坦和印度。參看馮承鈞等《西域地名(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2月，頁51、45、44、94、90、26、81、98、46、16、101、8。

44 見周祖謙《洛陽伽藍記校釋》，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年6月，卷五，頁97。

45 參看夏鼐《北魏封和突墓出土薩珊銀盤考》、馬玉基《大同市小站村花圪塔台北魏墓清理簡報》，兩文俱刊《文物》，1983年第8期，1983年8月，夏文頁5-7，馬文頁1-4。

46 見《洛陽伽藍記校釋》，卷三，頁67。

47 見《魏書·薛虎子傳》，頁9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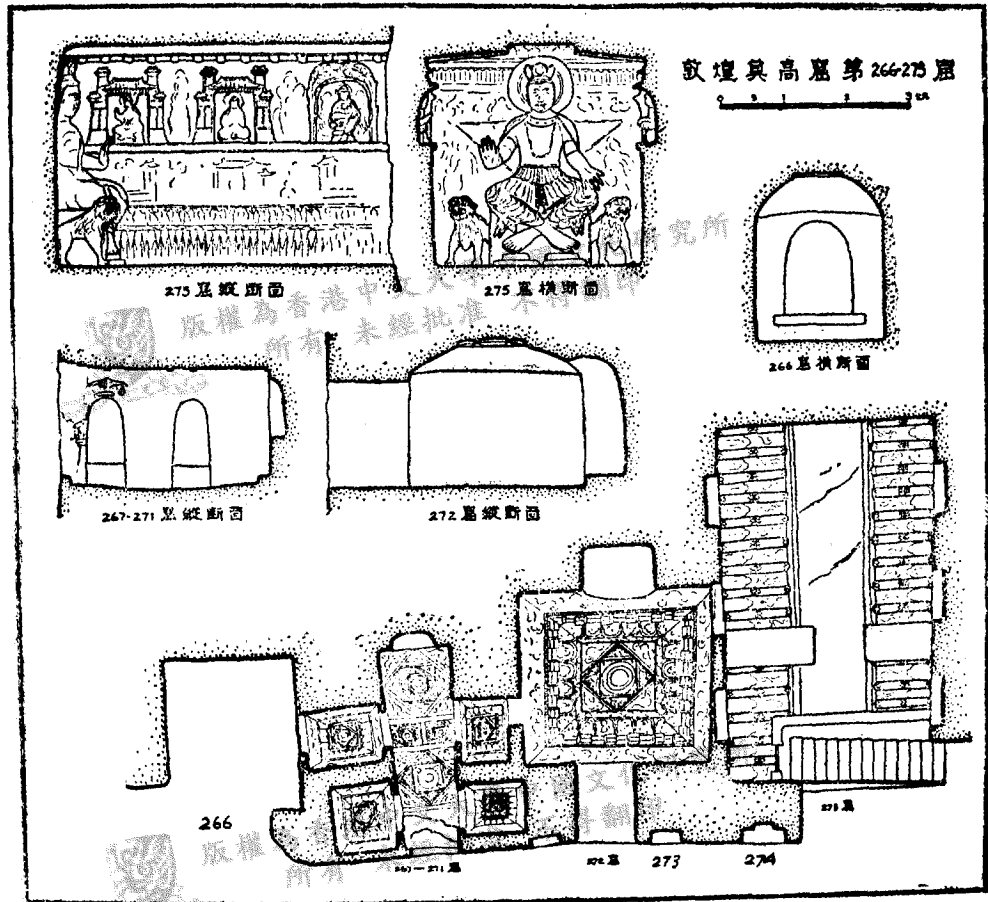
48 見《魏書·神元平文諸帝子孫傳·東陽王丕傳》，頁361。

49 見《魏書·恩倖·趙脩傳》，頁1999。《通鑑·梁紀一》繫此事於天監二年即北魏景明四年，並記：「促之[脩]上道，出城不自勝，舉縛置鞍中，急驅之，行八十里，乃死。」知脩並未抵敦煌。

50 見《魏書·世宗紀》，頁204。

51 即敦煌文物研究所認為屬於北朝第二期洞窟，共八座，其順序是：第259、254、251、257、263、260、487、265窟。參看注4。我們認為其中的第259、257、254、251等四窟時間略早。此四窟俱屬塔廟窟，他們與第275、272、268三窟的關係，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呢？還是尚有不同類型的問題呢？值得進一步仔細研討。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一 莫高窟第268-275窟平面、仰視、剖面

採自《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2期，頁58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二 第275窟主像

採自《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圖版四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三 第272窟主像，側壁繪千佛

資料來源：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四 第268窟主像、側壁繪千佛

採自《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圖版6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五 第275窟側壁上欄交腳菩薩和高闕形龕；  
 下欄繪本生，本生畫面中附有長條框式榜  
 題；上下欄間有單葉波狀忍冬文邊飾

採自《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圖版18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六 第275窟側壁上欄思惟像龕

採自《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圖版19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圖七 第275窟側壁上欄的漢式建築

採自《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圖版17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 Problems over Periodization of Existing Early Stage Cave Temples in Mo-kao K'u of Tun-huang

(A Summary)

Su Bai

Caves Nos. 268, 272, 275 of Mo-kao k'u are the earliest of the existing cave temples in Tun-huang. In the past these caves were supposed to have been built after Tun-huang was taken over by Northern Wei in 445 A.D. It has, however, been proposed recently that these grottoes were built during the period 421–429 A.D. This new dating, in the author's view, is questionable.

Although this group of cave temples have a close relation in respect of drawing techniques to certain early cave temples in Sinkiang, in other respects, they resemble the Yün-kang cave temples of the second period. Resemblance does not necessarily imply identity because there remains the problem of which influenced which. The one that influenced must be earlier than the one which was influence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historical background, it can only be Yün-kang that influenced Mo-kao.

As Yün-kang is far removed from Mo-kao, it must have taken considerable time for the influence to reach Mo-kao. It is therefore possible to see a number of the features of the second period of Yün-kang in the Mo-kao cave temples.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e cave temples under discussion were built during the period extending from the years when Nos. 9, 10 of Yün-kang were built (i.e., 484–489 A.D.) to the year when Northern Wei moved their capital to Lo-yang (i.e., 500 A.D.).

